



Manners, Ian James

Published i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Publication date:
2013

Document version
Også kaldet Forlagets PDF

Citation for published version (APA):
Manners, I. J. (2013). .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http://www.csstoday.net/Item/639.aspx>

北约研究大有可为

◎王义桅

北约首任秘书长伊斯梅爵士的三句话很好地概括了北约成立的宗旨。第一句话是“keep the Germans down”(扼住德国人),就是说要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第二句话是“keep the Russians out”(挡住苏联人),就是说把苏联挤出欧洲;第三句话是“keep the Americans in”(留住美国人)。这三句话,目前为止仍然起作用,只不过苏联已经解体,但是针对俄罗斯的意图依然如旧。变化了的情形是针对德国的。德国统一之后,并未复活北约成立时所担心的军国主义,反而通过引进欧元,成为“欧洲的德国”。这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北约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必须结合新的时代变迁和北约的转型,做与时俱进的研究。

研究 北约 了解美国

北约宣称,北约是跨大西洋关系当中的一支稳定力量、和平力量。与此同时,北约宪章又指出,北约是捍卫西方价值观的重要工具。今天,北约拥有 28 个成员国,就连横跨东西方文明的土耳其也是北约成员国。但是,北约作为跨大西洋关系的安全与价值纽带的本色未变。对北约的内外认识存在巨大反差,这也使得北约研究充满挑战。

通常人们认为,北约是美国军事霸权的工具,甚至一些北约成员国,如希腊,也有大量的人持这种观点。美国与北约的关系,的确必须回答好的基本问题。

北约与美国霸权当然不能画等号,显著的差别是美国要做“世界警察”,而北约不然。“全球北约”(Global NATO),只是北约为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而建立的全球伙伴关系。北约要成为“世界警察”,可以说第一个反对的就是美国。因为美国要做“世界警察”,不会容忍第二个“世界警察”的存在,尽管北约是美国人发起成立的,正如联合国也是由美国发起成立,而美国常常绕过联合国行事一样。在亚太地区,美国有其双边联盟体系,更反对北约插手。所谓“亚洲版北约”并非北约的想法,而是一些亚洲国家(如印度)呼应或揣摩美国的想法。这反过来也提醒我们,北约对美国霸权除了帮凶作用以外,也有掣肘的一面。这样,对北约进行研究,是探究美欧关系的重要渠道。

美国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利用北约达到霸权目标的?北约有三个总部:政治总部在布鲁塞尔,军事总部在比法边境的蒙斯,转型司令部在美国诺福克。形象地说,北约的大脑在诺福克,肌肉在蒙斯,而嘴巴在布鲁塞尔。因此,美国对北约最大的影响是战略观念的打造。

同时,美国也是北约军事装备、技术和系统的主要提供者。欧洲的军工体系对美国依赖较大,惠普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欧洲的业务不逊于在美国本土。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就不只是体现在战略意志等软的层面,军工体系、军事技术等硬的层面更是如此。这是欧盟迟迟不能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主要原因。此外,美国驻北



■2011 年 3 月,北约率先发动对利比亚的空袭,并在之后的近九个月时间中扮演着近乎决定性的军事行动角色。

资料图片

约大使以及一直由美国将军担任的北约军事最高指挥官,是美国影响北约的人的因素。当然,更大的影响在于美国一直是北约最大的出资方。

即便如此,美国希望北约做的事情不见得能做成,而美国不想要北约做的事情则北约绝对做不到。换言之,美国是北约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北约宪章规定,必须在联合国授权下展开军事行动以及北约的一致表决通过原则,这些约束,也是美国发挥其超级大国影响力的途径。所以,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才采取单边行动,在海湾战争才搞“志愿者联盟”。

除了美国之外,北约与欧盟的关系,也是美国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欧盟 27 个成员国中有 21 个是北约成员国(算上 2013 年 7 月要入盟的克罗地亚,将有 22 个成员国重叠)。为何欧盟作为一支和平的力量获得 2012 年诺贝尔和平奖,却又支持在普通人看来作为军事霸权和美国打手的北约呢?欧盟防务一体化建设,绕不过北约的坎儿。在欧洲大陆,欧盟如何与北约长期共存?这是中国学界要回答的又一重要问题。

北约研究
可深化中国对国际安全的认识

对中国而言,开展北约研究,具有三方面的必要性。

一是作为国际组织研究的必要。作为一个冷战时期的军事组织,北约度过了冷战结束、华约解体的合法性危机,以及“要么走出去要么无足轻重”(out of area either out of business)的尴尬,成功实现转型,成为军事、政治两条腿走路

的国际关系研究近年发展很快,但国际安全学科相对滞后。对国际问题从安全视角做超越中国、超越双边关系的科学和前瞻性研究,十分有必要。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角色的日益凸显,国际安全研究的知识、观念储备显得十分紧迫。为此,提供解剖麻雀——北约,推动中国的国际安全学科建设,无疑是一个重要选择。

三是中国外交的必要。中国与北约没有外交关系,然而北约近年来对发展对华关系十分积极,原因是它所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而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性重要力量。北约开展对华关系的目标是将中国纳入全球伙伴关系,为此北约积极开展与中国的接触和对话。目前,双方已在政治外交、防务安全等领域逐步开展对话。未来中国与北约关系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值得我们关注。

北约在变化,这是北约研究的重要前提。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便是为北约转型打造的核心概念。可惜由于欧洲成员国的反对,以及美国国务院对国防部的制约,导致为北约“战略新概念”打造的理念,未能出现在里斯本峰会确立的北约“战略新概念”中。然而其精神贯穿始终,对中国深化关于国际安全的认识无疑具有重要启示。

如何开展北约研究

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提出,了解世界,译介为第一要务。北约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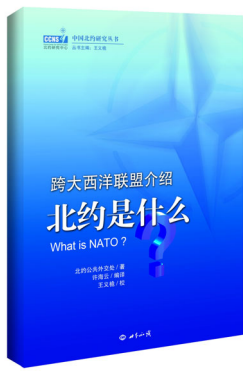
究,可以从翻译、编译国外最新北约研究成果以及北约出版物开始。

更重要的是,需要开展对北约的独立研究,了解北约的决策机制,了解它作为一种国际组织的生命力和属性。为此,开展与北约的对话,直接了解北约,批判式掌握第一手材料十分重要。

此外,提供北约的横向解剖,对网络、太空、海洋等全球公域问题开展前沿式个案研究,提升中国在国际安全学科与国际社会的对话水平,也是加强北约



■中国目前出版的北约研究丛书



作者/供图

研究的重要副产品。

北约研究在中国还不够专业和系统,尽管涉及北约的研究很多,但对北约本身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太多的空白。基于这些设想,中国人民大学日前组织编写了中国—北约研究丛书,以此呼吁国内开展对北约的专业、精粗研究,深化我们对美国、欧洲及美欧关系、国际安全、国际组织等专题的研究。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

理论 | Theory

◎Ian Manners

规范性力量的研究方法在过去 10 多年里吸引了学界的大量关注,中国学者也对这个研究视角表现出强烈兴趣。在一个全球化、多边主义以及多极化的时代,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权力以及行为体在全球政治中的变化?本文对规范性力量的研究将从以下三方面作简单讨论:规范性力量的定义,规范性力量的分析方法,对全球行为体的评估。

规范性力量的定义

社会科学中对规范性力量有许多不同的解释,然而欧洲研究中的规范性力量有三个特别的含义。第一是对规范性理论的强调,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判断和论证社会科学领域中所宣称的真理。第二,规范性力量是一种权力,是一种理念上的力量而不是物质或者形态上的力量。第三,规范性力量是完善的(理想的)国际行为体应具备的特征。

对照马克思·韦伯对暴力、物质回报和社会荣誉的划分,我们同样也可以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分为三种形态:武力、物质利诱、规范正义。武力是指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本身的实力存在或者它具有的强制性力量。物质利诱是指行为体所具有的向他国提供或者拒绝物质利益的权力。与前两者相反,规范正义,如果其论证是令人信服、有吸引力的,就可以通过劝说、讨论等手段,提高或者降低其他国家的威望。在这个层面上,规范性作为一种权力而言,是一种能够使用“规范”的力量,而不是通过武力或者物质利诱来实现。

使用规范性力量的能力,是一种对规范进行界定、评价的能力。但是,它需要不断地和其他形态的力量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并达成妥协。国际规范的推广、国际贸易以及国际维和行动等实践,都面临如何将这三种形态的力量相互结合的难题。规范性力量的核心假定是:优先使用规范性力量能够确保同时或者随后使用的武力以及物质利诱在更加公正的范畴内使用。

规范性力量的分析方法

研究全球政治中的规范性力量有三个层面的分析框架:国际行为体所推广的规范准则;国际行

全球政治中的规范性力量

体为了推广、促进这些规范所采取的行动;这些行动所产生的结果。该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通过考察规范、行动以及结果,来分析国际行为体的研究方法。

研究规范性力量第一个需要考察的是规范,即理解什么样的规范才能产生“权力”。如果这些规范来自于通行的国际准则,比如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法案中的条例、联合国气候大会框架等,它们会更具备说服力和合法性。

研究所考察的第二个方面是行为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促进规范。如以上所讨论的,行为体的行动通常包括说服、讨论以及树立威望或者谴责等。如果这些行为能够建设性地介入、通过国际规范的价值观来说服,那么它们可能会更有效。

研究考察的第三个方面,是国际行为体为推广规范而采取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规范正义最终产生的结果包括

社会化(socialization)、伙伴关系(partnership)以及所有关系(ownership)。社会化是指参与、讨论以及了解的过程是开放性的;伙伴关系是指由参与各方包括多边的、双边的、国际的以及跨国行为体所产生的制度化关系;所有关系则是指通过伙伴式的参与和协商,产生的共同的或者地方的所有权。通过对这个层面的考察,可以了解这些结果如何促进对正在倡导的准则的重新思考。

评估全球行为体

采取规范性力量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比如欧盟等的作用),主要是突出规范性作为一种“权力”,是有别于物质利诱和武力的。

通过比较研究来评估国际行为体是否更愿意倡导自我理解和符合国际准则的规范,还是相对来说更倾向(或者不倾向)使用强制行动,以及它们是否能够增强国际社会中的多元主义、协作性等产生影响,可以发现,较少通过采取强制行动倡导国际准则的行为体,更容易为全球协作、全球治理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政治学系;梅一译)

地区研究 | Regional Studies

◎高静

1982 年,墨西哥引爆横扫拉美地区的债务危机,使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成为拉美国家“失去的 10 年”。而 1994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又因其烈度之大、波及之广被冠以“Tequila”(西班牙文 Tequila,是一种墨西哥产的龙舌兰烈酒)危机称号,由于危机发生在金融自由化改革后,也被誉为“21 世纪的第一场危机”。随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用“倒账”、“危机”、“动荡”等作为关键词来诠释墨西哥经济。

2012 年 3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墨西哥金融体系稳定性评估报告》(Financial System Stability Assessment)。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墨西哥金融体系经受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其抗压能力因此而得以证实。不仅如此,墨西哥银行业收益率较高,流动性良好,资本金充裕。这个评估结果无疑让人们重新审视墨西哥金融形势。而对于研究拉美金融的学者而言,似乎认为墨西哥金融改革取得卓著成绩的说法也站得住脚。

的确,从治理金融动荡的角度看,

1994 年危机之后墨西哥实施的一系列金融改革富有成效。墨西哥金融改革可以以 1994 年危机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改革可以用国内自由化和外部自由化两个词概括。其中,国内自由化是指取消国内金融业限制,主要包括:行业准入自由化、银行私有化、利率市场化;外部自由化则是指开放资本账户,取消多重汇率,允许资本自由出入。

实际上,墨西哥金融改革是其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延伸。债务危机后,墨西哥迫于债权人压力,接受了“华盛顿共识”,实行全面经济改革。金融是经济运行的血脉,金融改革自然是全面经济改革的应有之义。墨西哥金融改革选择的路径必然是速战速决的“休克疗法”。据世界银行资料显示,早在 1991 年墨西哥就彻底实现了国内自由化,外部自由化也完成了 80%,外资大举流入为银行业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墨西哥经济因此而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1992 年,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顺利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1994 年该协定正式运行。然而,庆祝的烟火未散,一场波及拉美地区、震撼全球的金



■墨西哥城商场的购物者

资料图片

融危机在圣诞前夕轰然爆发,危害极大,影响深远。

危机的原因很复杂,宏观上的原因主要是汇率僵硬,微观上的原因是监管不力。为此,在改革的第二阶段,除了继续实施第一阶段的自由化政策外,墨西哥将改革焦点转化为:在宏观方面,当局用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逐步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替代固定汇率制作为稳定物价,进而稳定经济的“锚”;

在微观方面则强化了金融监管。

后危机时代的墨西哥银行业的盈利能力、经营效率和稳健性迅速提高。相对于金融危机的惨重代价,金融稳定的意义不言自明。然而,问题的关键是,随着上述指标的改善,墨西哥银行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却日趋暗淡。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墨西哥的投资率却长期维持在 20%左右(按美元现值折算),对

新兴国家而言,这一水平的确很低。

通常,投资分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前者对后者具有净“挤进”效用。由于墨西哥政府不断削减公共投资,开发性银行功能日益衰退,净“挤进”效用也逐渐弱化。这样一来,提高投资率的重任便落在私有部门肩上。现实中,作为私有部门最主要的融资渠道,墨西哥银行业对私有部门贷款与 GDP 之比长期徘徊在 18%左右。即使是 2003—2008 年这一历史罕见的持续增长阶段,墨西哥银行业对私有部门贷款与 GDP 之比也没有超过 20%。

墨西哥银行对私有部门贷款如此之少,主要原因有三。第一,1994 年金融危机后,当局意识到利用外资的局限性,从而积极推进“去美元化”,转而以吸纳国内储蓄作为银行业主要资金来源。然而,墨西哥国内储蓄率很低,只有 21—22%(不及中国的一半),低储蓄率限制了墨西哥银行的贷款能力。

第二,墨西哥银行业储蓄—贷款比率很高,达到 150%。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储蓄并没有转换为贷款。美洲开发银行的资料显示,墨西哥银行业持有政府债券比率高达银行资产的 30%以上,

政府挤占了银行原本可以用来贷款的资金。

第三,作为危机处理手段,大量墨西哥金融机构被外资收购,墨西哥银行业因此被“外国化”。联合国拉美经委会资料显示,墨西哥 90%以上的金融资产被外资控制,在全国最大的 50 家银行当中,40 多家是外资银行。外资银行的内部监管以及母子机构联合监管严格而规范,这对墨西哥整个金融体系稳定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外资银行比本地银行呈现出更为显著的顺周期性。外资银行的这一特点,加上生产性投资具有的长期性,决定着外资银行不太可能对墨西哥的资本形成作出较大贡献。

由此可见,稳定的墨西哥银行业被外资和公债“绑架”,指标的稳定是以牺牲其促进资本形成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力为代价的。毫无疑问,这一现实与改革初衷背道而驰。因此,从发展的角度看,墨西哥金融改革成绩是否卓著便值得商榷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